

季辛吉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

王建勛譯

譯自一九七二年一月第三七二期法國「新觀察者」週刊 (Le Nouvel Observateur)

作者歐利維耶·陶德 (Olivier Todd)

美國外交政策的變更幾乎對世界各國的政治都發生重大影響，當然那些負責制定美國外交政策的人，就特別為世人所重視了。而當前對於美國外交政策頗具影響的人物，不是國務卿羅吉斯，而是自德國移民到美國的猶太人——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他是一位講求「實力」的知識份子，亦是一位居住於德國多於以色列，貢獻於美國多於德國的「戰略家」。季辛吉自幼即崇拜前德國首相俾斯麥 (Bismarck)，但在一九七一年却成為美國尼克森總統為改善與中共關係而進行一場賭博的伙伴。季辛吉曾言：「二十年後，世人將不再談論不足輕重的越戰史蹟，而代之以人們特別談論的將是美國改善與中共關係的一種革命行動。」此事實象在留待歷史評斷以前，先從對季辛吉的認識上來檢討美國的對外政策。

智利駐華盛頓大使桑塔·瑪瑞亞 (Domingo Santa Maria) 於離開華盛頓任所以前，曾要求美國國務院引見尼克森總統告別，但却因無法排入日程而遭到國務院拒絕。其後，瑪瑞亞還是透過白宮顧問，現年四十八歲的季辛吉安插，才獲得尼克森總統的接見。對於國務院的拒絕，瑪瑞亞雖自認是敲錯了門，但這亦說明當前每年支領四萬二千五百美元的季辛吉，其對尼克森的影響力已在國務卿羅吉斯之上了。

在華盛頓來說，什麼是真正的權力？從供給尼克森總統的資料上，以及所能了解到尼克森的想法而提供使其能够接受的各项計劃，而今沒有人能比季辛吉更具權威了。季辛吉每天上午七點四十五分到達白宮，通常他與尼克森會面是在早晨九點。在以前三十個月中，季辛吉是在白宮地下室工作，而

今他已搬到具有兩扇門可通往尼克森總統辦公廳的一個很大的房間。季辛吉每天約有八十分鐘與尼克森在一起，甚至尼克森到歐、亞各地訪問或在大衛營、和加里福尼亞、福羅瑞達海灘休假的時候亦是形影不離。季辛吉既非經由美國人民選舉，亦不是華府的正式官員，而是尼克森私人的顧問，並擔任包括有中央情報局、參謀首長會議，以及各部會首長三十人所組成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執行秘書。

季辛吉是於一九二三年五月廿三日出生在德國的Fürth地方。當時因為納粹對於猶太人的排斥，季辛吉與他的哥哥 (Walter Kissinger) 曾被趕出他們所就讀的學校。季辛吉對於這段歷史雖記憶猶新，但却不願提到這不幸的事蹟。他只認為「種族的迫害」對他的生活並沒有太多的影響，過去的就好像一場並不激烈的足球比賽一樣。他是在一九三八年隨着他的父親 (Louis Kissinger) 從德國經過倫敦而移民到美國。他到達美國是十五歲，尚未完成中等教育，他先後在農場及很多工廠工作，靠自己賺錢而在華盛頓喬治中學 (George Washington) 接受中學教育，並在夜間讀完高級中學。在季辛吉的回憶中，這是他最艱苦的一段時期。

一九四三年，季辛吉開始服役，不久他就升為士官而擔任着反情報作戰工作。然後他又被調為第八十四師的師部翻譯。他亦曾參加對德作戰，所以他亦經常不能忘記德國被蹂躪的情形。當時同季辛吉並肩作戰的一個上尉而今已是國防部高級官員柯拉姆 (Fritz Kraemes) 即曾鼓勵季辛吉繼續深造，他說：「亨瑞！你知道的很多，但你却什麼都不知道，你應該再受教育！」

季辛吉退役以後，即獲得紐約州的獎學金而進入哈佛 (Harvard) 大學。在哈佛大學期間，他頗受政治學院院長埃利奧特 (William Yandel

Elliott) 的影響。季辛吉每星期均接受他的教育，而灌輸了很多杜斯妥也夫斯基 (Dostolevski)、黑格爾 (Hegel)、康德 (Kant)、斯賓諾沙 (Spinoza)、荷馬 (Homère) 等哲學思想。他最後以三百五十頁的論文，以歷史的意義來討論斯賓格勒 (Spengler) 和康德 (Kant) 的學說與思想，而完成了大學教育。

當一九五四年，結束了麥克阿塞將軍所揭開的韓戰，東南亞公約的簽訂，亦正是美國急迫要在東南亞接替法國所遺留下的任務。就在這時——一九五七年，季辛吉又通過了博士論文。他的論文題目是討論「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二二年，奧國梅特涅 (Meternich) 和法國卡斯特累 (Castlereach) 與「世界和平」問題。這篇論文主要是闡述在革命時期中的保守主義問題的歷史意義。無疑這篇論文已代表季辛吉不使用武力思想的萌芽，主張改用「同盟外交」和「勢力均衡」策略的開始。

當一九五七年，美國艾森豪總統反對小岩 (Little Rock) 事件所造成的黑、白種族問題時，季辛吉已是哈佛大學的講師。一九五九年古巴赤化時，他已成爲哈佛的副教授，一九六二年才升爲教授。他在一九四九年即與同爲德國移民的安娜 (Ann Fleischer) 結婚，迄今已有兩個子女。但在他們結婚十五年後即告仳離。在一九五七年，季辛吉初次與洛克菲勒 (Nelson Rockefeller) 會晤，即頗爲洛克菲勒所賞識，這亦是此後季辛吉接連於共和黨的一個主要關係。

在一九五七年間，季辛吉即寫出他第一部著作：「核子武器與外交政策 (Nuclear Weapon and Foreign Policy)」，主要是述說核子戰爭可以避免。所以他強調，僅憑核子武器作爲一國對外的實力是有很大缺點的。很明顯的，季辛吉寫出此書之目的，乃是要糾正當時艾森豪總統的「核子報復」主義。其影響到甘迺迪總統時期就援用了「彈性報復」主義。不久季辛吉在白宮又影響了尼克森從「核子優勢」而轉變爲「核子完備」的政策。

在這部核子戰略的著述中，季辛吉主要提出核武器的發展應該受到限制。他根據這個理論又寫了「選擇的必要」(Choice Between The Two) 一書。一九六五年再著「聯盟的困難」以及一九六九年的「美國外交政策」等

書 (American Foreign Policy)。在季辛吉所有著作中，他雖然具有很高的寫作技巧，但其風格仍顯得非常生硬，對華盛頓而言，無疑是在澆冷水。例如他說：「在經過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很長一段和平時期，人們不但對悲劇的感受已經消失，並且對於那些曾經造成災難的國家亦少有記憶。而今沒有任何理由美國仍不了解核子的發展可能會造成人類的悲劇。但是他這項理論，很爲當時仍爲副總統的尼克森所重視。此時季辛吉雖然已在哈佛以及各種研究機構中顯露光芒，然而反對他這種理論的人却批評他是一個隱藏着「極不安全」與「驕傲」的知識份子。」

至一九六八年美國大選期間，洛克菲勒就再把季辛吉推荐给尼克森，希望作爲尼克森未來的「班底」。但是季辛吉却不願洛克菲勒的善意，在邁阿密召開的共和黨大會中，乃聲言「尼克森並非適當的總統人選」。他如此對尼克森的輕視，又如何能爲尼克森而工作？尼克森又如何能啓用曾對他侮辱過的人？這當然還是政治因素與尼克森的新作風所促成。

所以在尼克森決定啓用季辛吉的時候，曾在一項酒會中與他晤面，當時季辛吉即以一種懷疑的心情請求再作一星期的考慮。季辛吉曾對他的猶豫解釋說：「對於我們這一時代而言，尼克森只是一個極右派的領袖，我可以保證他是不能執行正義的人。但是出身於哈佛一些年老及年輕的知識份子及甘迺迪一派的人物如丹地 (Dundy)、加爾布華斯 (Galbraith)、西萊辛格 (Schlesinger)、謝林 (Shelling)、亞莫林斯基 (Yarmolinsky)、歐易斯塔特 (Neustadt) 等都鼓勵季辛吉接受尼克森的聘用，幾乎他所有的朋友都勸告他應該接受。所以當尼克森的命令下達以後，左派的「新共和」週刊 (The New Republic) 就大事宣揚，好像是保守派的歷史發生了一件極重大的事情。」

儘管尼克森與季辛吉是一個不同理想的搭檔，但三年來的經過和演變，季辛吉完全依循一種謹慎的歸納與分析的方法來抑制着個人的願望。他推荐的一些僚屬多爲尼克森所接納，所以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他決定辭去哈佛大學的職務而專心留在白宮。尼克森在寫給他的一封信中說：「坦白而言，我的政府是不能缺少你這個人……。」而季辛吉亦保持相當的風格答覆尼克森說：「在重要問題上是沒有季辛吉的政策，如有的話，那是除了聯邦政府以外，在通過「國家安全委員會」整體機構下所產生的。」

季辛吉對於各種事務的處理方法，主要是對於任何一個問題都不是從一

個單純的政治路線上來擬定的。他堅持要匯合多方面的意見來作適當的選擇，然後提供給尼克森總統，這正像甘迺迺迪總統時期的麥納瑪拉所建立的一種制度。尼克森在出任艾森豪總統時期的副總統時，亦曾看到艾森豪總統所受到政府機構所直接施予的壓力，所以尼克森出任總統以後，就決心拒絕政府機構所作的官僚化與形式化的各種建議，而要使季辛吉成爲一個有力的「盾牌」，「過濾」的機器。而季辛吉爲了光明磊落，亦沒有在自己的願望上太多堅持，這亦是今後季辛吉對於尼克森還會發生更重要影響的主要原因。

季辛吉對於他所作的各項建議，亦同意作詳盡的解說，但只限於對尼克森與華府方面。季辛吉雖然表現得如同一般人一樣的平凡，但是他所建立的假想以及一切情勢的演變却從未落空。並且他對於尼克森的影響與其前任白宮顧問羅斯陶（Walt Rostow）亦迥然不同，因爲羅斯陶經常都不能獲得詹森總統重視或採納他的建議。因而季辛吉各項精確的觀點與建議，逐漸亦在華府中獲得了聲望，尤其其他的一些助手們更讚美他處事的步驟如同一個偶像一般。

季辛吉的工作得力於兩種方法；其一是首先了解華府各部門所提出的意見；其二是使得某些可行的方案，反覆推敲，在某些可行的選擇中來作爲尼克森自行採納的決定。就如銷毀生化武器，以及琉球歸還日本等均是季辛吉運用此一方法所產生的傑作。因爲季辛吉很了解他的權力不是用於造成其他人理想的障礙，而是在不顛倒是非中來尋求真理，然後再向尼克森作確切的說明。

他這種工作方法幾乎是科學的，但重要的，在實行的意志上，季辛吉還能夠扮演一個勇敢的角色。在本質上言，季辛吉與尼克森同樣面對着共產與自由世界間的各種惡劣情勢，當然都要先有自衛的本能。當美軍上尉威廉·卡萊（William Cally）在越南殘殺百姓事件被揭發以後，在此一事件的抽象概念及理論上，是屬於美軍介入越戰，而不只是美軍殘殺越南人民的單純事件，它頗具煽動美國反戰的影響。但是季辛吉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却是表示很傷感的笑着說：我家有十三人是死在希特勒的集中營中，你們怎能相信我是不重視人類生命的人？

無論如何，季辛吉的外交政策是要試圖達成在核子武器競賽方面避免可能造成的災害。因此，季辛吉在觀念上就與華府官員們有所不同；季辛吉的外交政策是從全球戰略來看；他認爲如果沒有中東與越南戰爭，柏林問題又如何能達成協議？他的同僚對於季辛吉的全球戰略的概念認爲是出自一種天賦，就如同對音樂的感受一樣。然而對於一些重大事件，在季辛吉而言，都是互有因果，一件件的聯繫而再聯繫起來的。所以季辛吉對於同僚們的答覆仍是很肯定的，他認爲各種問題的發生都是有着關聯的，除此其他的想法都不合乎實際。

但是季辛吉又特別指出對於全球戰略的觀察是不能東拚西湊的。他舉例說：亞洲的動亂，在理論上說，應該是來自於力量不能均衡所致。而形成今日中國大陸局面亦是這種結果。但是他認爲造成此一不均衡形勢的原因，不是來自於中共政權，而是來自於中國大陸已擁有龐大的七億人口。所以他的結論就是對於中共問題的看法不只是一要觀察他的政權，而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它所擁有的七億人口。

季辛吉的理論是說：當前因爲科學武器的發展不能限制，而人類信心的喪失，武裝競賽就很難避免了。他一條鞭的邏輯認爲：任何一個國家核武器的擴張，必導致另一個國家核武器的進展。然後又是一個國家在核武器方面開始新的競爭。所以他斷言，如果蘇俄與中共任何一方壟斷核武器的發展優勢，那就會毫不猶豫的從事敵詐。從這個結論中，季辛吉不認爲「善意」可以能够鬆弛國際間的緊張情勢，至少要使得核子實力的發展立刻獲得均衡，如此才可避免戰爭。

四

但是季辛吉亦不認爲「核子優勢」能够成爲維持世界和平的唯一力量。因爲他認爲「和平」只是一個夢想，是一個很難確定的抽象名詞。所以他就主張還要在國際關係上從事更多的努力，能够使國際機構在維持世界和平方面，給予那些不負責任的共黨國家有更好的鼓勵。他解釋國際關係與各國內政之間的關係說：美國不能改變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內部結構，對於一個政府制度如以一種審美的角度來分析，他認爲前法國戴高樂總統的作風，完全是來自阿爾及爾的危機，當然他的作風亦是一個適當而偉大的行動。

季辛吉在這種理論中，很明顯的就把國際政治與軍事分開；在軍事上，世界是兩極的，只有美國和蘇聯在同樣握有核子優勢中，使其成為建立國際新秩序觀念與維持世界和平的基礎。因為一方壓倒性的軍勢優勢，對於保證世界和平仍是極脆弱的。但是在國際政治上應是多元的。世界既不能受那一個大國之支配，當然就不能使世界完全在那一個國家保護之下，必須要在一個國際多元化的情勢中來調整國際間的關係。

季辛吉對於在軍事上達成兩極的策略，是主張從改善與其他國家關係上來加強維護美、蘇兩強的軍事優勢。所以他認為對於其他亦在尋求自主的國家，在世界很多國家經濟仍屬落後當中，一個無線電廣播員所產生的宣傳效力，遠比B-52轟炸機為佳。

季辛吉認為對於那些尋求自主國家的實際內容亦應深入了解與分析；不但是要解現在與今後的政策會有什麼變遷，在某些革命理論上所建立的國家，這些革命理論是否只是一個官樣文章？因為它亦可以再用一種改革的行動來註釋它。所以季辛吉認為所有一切內、外的力量都可以推動着一個政權在短促的循環中而能有所改變。在一九六六年，季辛吉曾這樣的寫道：對於改善與中共關係，應該進行談判，因為中共如果沒有領導階層的法律規章，整個中國大陸仍會恢復到非常自由的狀態。他基此認為：對於一個政權不但要了解它所表現出暴力的外貌，並且還要研究什麼是他們所要追求的目標……：如果一定要迫使其走向死路，則它就只能採取唯一的決定，要以「專橫」的行動從死胡同中出來。

五

季辛吉把近代世界政治制度分為二種類型；一種是實驗主義的官僚政治，如美國是；一種是建立在極端的革命理論當中的政治；和一種較為溫和和的革命理論的政治。但是季辛吉認為一個極端的革命理論政治有時亦會轉變為溫和的理論政治。他這種看法，純粹是要把握一個大的方針來解釋為什麼美國的對外政策要以柔和的方法來代替那些嚴厲的制裁。在季辛吉而言，有很多美國政治思想家都有他們不同的範疇，但是他認為技術性的問題，從它對歷史的意義上言，並沒有太多的可能性。

雖然季辛吉對於共產主義無論在其認識或感覺上都沒有任何好感，但他

季辛吉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

認為共黨的革命是要尋求建立另一種世界的實際表現；而不是要推翻這個世界。同樣他對於尼克森的一些聲明所形成的「尼克森主義」，亦不完全贊同，因為季辛吉認為即使在那些主張溫和和革命的共黨國家當中，其所強調馬克斯與列寧的經濟理論，亦只是作為實行專制、獨裁統治的一種工具。

無論如何，所謂建立世界新秩序，季辛吉認為是有可能的，但必須要有聯盟的組織。對於東南亞，他認為東南亞公約組織已經垂亡了。對於北大西洋公約，他認為亦已遭到眾多的困難，這主要是在以往若干年中，北大西洋各國的政治尚未達成調和。因此，季辛吉主張美國應結束「國際警察」的行動。他說：如果美國仍要繼續留在非共黨國家地區內，它就要耗盡所有財富，結果美國在全球任何一個地區上，都不可能收到使該地區採取同樣或有效的行動。相反的，如果美國退出這些地區，使世界形成一個國際多元化的政治，在長遠上來說，對美國是非常有利的……美國可以從改正這種抽象而無效果的行動所造成的衰落，以及從國際多元化政治的相互牽制中所產生的平衡力量來約束當前美國所欲急劇干預的情況，其可能創造更好的歷史遠景中而獲得更多的利益。但是一直到季辛吉建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司令部的指揮官改由歐洲人出任以後，美國國防部已把季辛吉視為一個異端。

所以季辛吉亦曾預言，在數年以後，在軍事兩極化、國際政治多元化的發展中來建立國際新秩序的理想，對於美國外交政策上的哲學基礎將會發生很大衝擊。這是他認為由於美國的外交政策已成傳統，此一新的觀念是很容易在美國建立起來。因為在改革者與實驗主義政治間的相互關係，雖然在國際關係正常化的構想上同具無比信念，但對於那些不同政治制度國家的排斥，仍是最大的阻礙。他希望依賴於那些要求建立完整世界組織信念的繼續反映而能達到實現的目的。季辛吉說：近代的雙關論沒有解決全部問題，但是均衡的重要並不在於物質而是在於心理和道德的問題。在未來如能通過更多的信念，亦可以導致改變以核武器作為均衡的情勢。

季辛吉的思想不但反對馬克斯主義，更特別反對列寧的馬克斯主義。十五年來，雖然他所表示的意願很有偏左的意味，而今他却盡量避免，只是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贊成加深那些反共的冷戰。他說：我們的目標不要被那些還具有壓迫力量的不成熟概念所轉移，問題不是如何避免共黨國家的如何報復；而是要在道德觀念的目標上如何產生更多支持世界政治多元化的創造

者而不是破壞者。所以雖然季辛吉認為無論美國的外交政策與其心理狀態是如何的混亂，但美國應利用更有效的談判方式以打開各種死結已屬必然。不過季辛吉亦認為這種談判如以單方面的善意仍是不會有何意義的。

六

季辛吉曾經常批評美國國務院：弄得使別的國家有利益，而自己反而担負責任；而其他國家都在尋求均衡，美國則仍一味的要維持一個平等的和平條件。所以他主張美國應以廣泛的「愛心」來對待那些不同制度的國家，就如同保護美國海外的資本一樣。季辛吉對詹森總統時期的魯斯克（Dean Rusk）亦頗多揶揄的說：美國與亞洲的共黨沒有爭論，我們繼續作戰只是爲了另外一些人。季辛吉亦經常說：如果沒有越南戰爭，美國仍是很愜意的。但是很多人亦會反問，即使有越戰，如果美國繼續撤軍，亦會達成政治解決的？所以季辛吉在處理越戰上面亦不無矛盾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季辛吉曾跟隨美國一個代表團到過河內，所以他對於解決越戰問題的棘手亦是非常清楚的。在美國哈里曼（Averell Hariman）帶領美國代表團前往巴黎舉行和談時，季辛吉就指出這種和談是不會有何進展的。在一九六九年一月的美國「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e）中，他對於越戰問題曾有這樣的評論：如果北越共黨不放棄戰鬥，他們即有贏得戰爭的可能；如果南越軍隊不能贏得戰爭，他們就有失敗的可能。所以在巴黎和談進行期間，季辛吉就試圖以一個「雙重談判」來解決越戰問題；一方是美國與北越作緩和越戰情勢的相互撤軍談判；一方由西貢與北越共黨組織作相互讓步的談判。他希望在這種方式下，能使美國的威望在極少損傷下來結束這場戰爭。季辛吉在這個「雙重的談判」觀點上好像並不反對南、北越組織聯合政府。但是他在「美國外交政策」（American Foreign Policy）一書上又重複討論越戰問題，好像並不主張南、北越組織聯合政府。雖然在這時候季辛吉與國務卿羅吉斯要使越南出現一個新的政府同表積極，但顯然季辛吉對於越南的政策仍只是限於理論範疇。

其後季辛吉又認爲時間對美國不利而主張採取「快攻」戰術，在季辛吉主張下的第一步行動，就是美軍與南越軍聯合進入柬埔寨進行大規模的掃蕩。在這個行動上，已使季辛吉所有對越戰問題解決的理論都成空言。主要是

季辛吉認爲對柬埔寨共黨進行掃蕩，可以對北越產生一種壓力，而迫使北越能誠意的進行和談；但結果適得其反，北越所表現的頑強反抗，使情勢更爲混亂。所以從對柬埔寨掃蕩以後，季辛吉的聲望在各大學中一落千丈。並且他要從擴大戰爭中獲得和平的主張，亦立刻受到學生們以及原曾鼓勵他出任白宮顧問僚們的反感。在對柬埔寨掃蕩，而使越南問題走入絕境，季辛吉才主張無條件的支持阮文紹政府。季辛吉亦完全了解到北越與蘇聯及中共同樣保持着一種距離，但此時季辛吉要想從絕境中脫出，就決定要通過中共的道路。這亦就是在中共發動兵兵外交以後，季辛吉於一九七〇年七月要偷偷溜到中國大陸的原因。

所以尼克森要訪問北平的意念，不是完全依靠羅馬尼亞和巴基斯坦總統的拉線，主要仍是美國對柬埔寨掃蕩所帶來解決越南問題的絕境以及未來美國總統大選之間的關係所促成。因爲從各方面來分析，季辛吉從來都沒有提出有關解決越戰問題必須要與中共妥協。就如季辛吉在一九六六年曾這樣寫道：在所有革命的共黨陣營，中共已超越了所有共黨國家而是最激烈的。此一不合情理的現象主要是來自中共的領導階層能運用自如；無論它的策略轉變，理論的延續，從不會以造成全面的混亂。他認爲這是它的「領袖」是建立在一個打破官僚政治的個人威望上面，而使其領導階層完全聽命於一人。所以他強調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領導者去世或其態度改變，則中共整個路線就會發生比其他共黨國家還要大的變遷。其後季辛吉對中共的本質還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他認爲：從歷史上言，中共要對鄰國建立一種宗主關係的勢力已經在伸延，並且中共建立政權開始就沒有以平等立場進行談判的經驗。所以他一反其在一九六八年以前對歐洲優先的主張而認爲：如果中共從其所獲得的核武器方面真能征服東南亞，則中共即可以它的真正軍事力量向整個世界進攻。但是儘管季辛吉對中共有如何程度的了解，在他前往北平以後，雖然一些美國中共問題專家多表贊同，但美國國務院一些高級官員們則批評季辛吉對亞洲事務仍「蠢然無知」。

七

在季辛吉陣營裏，亦有不少的中共問題專家，其中主要的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密西根（Michigan）大學教授索羅門（Richard Solomon），前美國駐

香港總領事大衛·阿斯巴納(David Osborne)、前駐中華民國美國軍顧問團副團長威廉·哥萊斯汀(William Gleysteen)、另外一位保羅·格拉斯柏(Paul Kreisburg)已前往非洲，大概是爲了要調查中共對非洲的影響。

在美國桌球隊訪問中國大陸以前，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Ceausescu)訪問美國的時候，在酒會間尼克森對中共稱爲「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再稱「中共」，美國一些中共問題專家就已體會出來了。無論如何，季辛吉於一九七一年七月和十月兩次前往中國大陸商談尼克森前往訪問的工作，就已經掀起國際間的浪潮，使那些讚同或羨慕的國家元首們都將注意力集中在這個目標上了，當然季辛吉這個人，亦就成爲國際上最熱門的人物了。

由於未來尼克森與毛澤東的會晤將會是這半個世紀以來最震撼世界的事件，美國內部還隱藏着很大的波瀾。而美國國務院對於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事件雖不表示贊同，但是又不願意在反對此項政策上與白宮發生衝突。因爲從很久以來，美國總統置白宮顧問於國務院之上已形成一種傳統，在羅斯福總統時期，他的重要作業就是依據一個外交事務的祕書古迪·赫爾(Gode Hull)和白宮顧問哈瑞·霍布金(Harry Hopkins)兩人。而今尼克森亦如同一些民主國家的元首們一樣，他們均已超出外交部門的影響而自行掌握重大外交方針。就如法國外交部長舒曼(Maurice Shuman)對外政策的制定能超越龐畢杜總統？英國外相荷姆(Douglas Home)能違反首相麥斯特的決定？同樣的西德外長奚爾(Walter Scheel)能不同意總理布蘭德的東進政策？諸此都說明當前國際政治潮流，對外政策幾乎都集中由國家元首來掌握的。所以尼克森啓用季辛吉的各項建議亦並不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事實上，在華盛頓而言，如果一定要在季辛吉與羅吉斯之間找出誰是真正外交政策的制定人，他們將無法了解，因爲他們只知道這是尼克森總統的決定。

目前季辛吉可能尚未過多的干預中東的事務而廣泛的交由國務卿羅吉斯來處理。但據近來季辛吉與其前哈佛同學納爾基斯(Uzy Narkiss)的一段談話亦可了解他對中東的意向。季辛吉認爲中東問題是世界不能解決的重大問題之一。但是他却樂觀的表示中東問題並非是永久不能解決的，他相信以色列在一、二年之內，必然要從其所佔領的埃及領土內撤退。這項理由是說：美國和以色列均不會與整個世界爲敵，同樣的美國與以色列亦不願意把戰爭擴大，問題是以色列能否改變他所認爲其所佔領的土地是合法的態度

。所以季辛吉對中東問題的結論：在一般情況下，最好是達成使雙方都感滿意的協定；而在中東，則最好是當以、埃雙方均不高興的時候始能達成協定。在理想上應是如何達成使雙方均無任何理由再繼續從事攻擊；但在中東則是任何一方均不可能再作攻擊的時候才能停止他們的攻擊。

紐約州參議員賈維茲(Jacob Javits)曾批評季辛吉的風格是「充滿了好奇心」的人。但是季辛吉却反駁他說：他是一個就「做愛」與「戰爭」作一選擇的人。然而今天季辛吉對各種外交政策的制定其所表現的特徵正有如對精神病理的分析一般，所以如果要對季辛吉作一個精確的論斷，可以說他是調解「尼克森心理」與「各方反應」的一個新的「自由保守主義」者。季辛吉到達白宮以來，雖然有棘手的越戰，但他尚沒有遇到像甘迺迪時期的古巴「豬灣」及詹森時期的「東京灣」事件。而今他要在他的理論基礎上儘量避免類似的這些事件出現。他說：我相信在第二次大戰以後，美國是從孤立中出來了。但是今天美國對外的承諾已成爲一個自絕的政策；美國的承諾不能拯救那些軟弱的情況而自己的力量先已衰退了。所以他說：美國絕對不是「孤立主義」者，只是美國不再有干預世界事務的全能力量了。很顯然的，季辛吉這種說法已從最近印、巴戰爭中，美國的影響和力量的約束上獲得證明。季辛吉在十二月間曾以私人身份向記者們解釋，他說：美國支持巴基斯坦是爲了避免戰爭的擴大，同時，美國已獲得亞雅汗(Yahya Khan)的保證與東巴談判，並釋放拉曼(Mujibur Rahman)，以達成未來能够在西巴之下使東巴自治的協議。

八

季辛吉未來對於尼克森與毛澤東的會談、越戰，以及尼克森參加未來大選等多方面，仍要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然而人們對於季辛吉未來的出處，都不相信他會出任部長和競選議員或州長。雖然他現在是最接近尼克森總統而亦是最有權力的人物，但他將來仍要恢復到教書的生活。當人們談到他未來的時候，他笑着說我不喜歡在阿利桑納(Arizona)大學工作。這是他暗示其前任白宮顧問羅斯陶，在離開白宮職位以後不回到麻省理工學院而到德州(Texas)大學一樣。但一般認爲季辛吉可能接受英國牛津大學的聘請或再回到哈佛大學。人們亦相信他會寫一本他在白宮期間的回憶錄。